

秦观文学教育及其价值初探

关鹏飞, 胡冰倩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随着西学东渐,西学中的文学教育危机也出现在我国文学教育之中,而来自科学技术的剧烈挑战则进一步加深了危机。目前,学界逐渐关注到“传统文学教育”的重要价值,但还缺乏从文学教育者角度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秦观是宋代著名文学家,但其文学教育者的身份却鲜为人知。秦观在主持蔡州官学期间大力推行文学教育,重振“斯文”传统,身体力行地传授士子诗文议论之法,不仅成功扭转当地轻文风气,而且教书育人双管齐下,取得显著成效。秦观文学教育所蕴含的丰富启示,既可供从事文学教育的人灵活学习,也能为当下的文学教育充分赋能,还可在未来改进上提供重要参照。

关键词:文学教育;秦观;诗教;文教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2025)06-0068-11

收稿日期: 2025-0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大项目(23JDTZ011);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体观念与实践研究;

绍兴文化研究工程2022年度重大项目(22WHZD01-19Z);绍兴宋韵文化研究·绍兴山川景观的宋代形塑。

作者简介:关鹏飞(1988-),男,浙江安吉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胡冰倩(2001-),女,安徽马鞍山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02

所谓文学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这里取其广义概念,即“文学教育是以文学为媒介培养人的活动”^①,而“文学教育”中的“文学”也取广义,即“‘文学’是一种诗文并举、文笔兼容、包含各种‘纯文学’和‘实用文’在内的杂文学,或者说广义的大文学”^②,这种“文学”概念比较接近于中国文学传统。目前,学界已关注到“传统文学教育”的重要价值,出现一批优秀的专著和论文,从先秦顺流而下,对各个历史时期都展开较为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为重新认识、改进当下的文学教育提供诸多真知灼见。^③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教育在今天仍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甚至有两本专业期刊不约而同组稿展开讨论。由内来看,当下文学教育中的“文学性”“人文素养”等核心要素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放逐;从外观察,文学教育更是面临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带来的诸多挑战,如文本阅读大幅下降、共情能力不断减少、系统思考逐渐碎化等。^④实际上,从广义文学教育出发,每当社会结构、科学技术和传播媒介等重大变化时,文学教育就会面临来自内外的各种挑战,省视身处其中者的应对之道,无疑会给我们很多启示。被陈寅恪誉为文化造极的宋代,就发生了这类以王安石变法为标志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科举领域以经义取士代替诗赋取士的改革,

①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②陈雪虎:《传统文学教育的现代启示》,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

③如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郭英德《中国古代文学与教育之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程嫩生《中国书院文学教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吕洋《先秦时期文学教育探源性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陈平原《六说文学教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张心科《清末民国中学文学教育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陆胤《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梅潇尹《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等。

④详细情况可参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所刊发的系列论文。

使文学教育面临巨大危机。^①元丰八年(1085)秦观考中进士第,释褐担任蔡州学官,直到元祐五年(1090)秦观一直主持蔡州官学,取得较好成绩,后入京升迁为太学博士。秦观是宋代获得代表性成就的著名文学家,其主持蔡州官学时间又恰逢熙丰政治文化转为元祐政治文化的特殊时期,因此,秦观在蔡州的文学教育活动及其所呈现出的文学教育思想^②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下面从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重振斯文:秦观蔡州文学教育活动简述

蔡州虽是腹地,却民风犷戾,据程民生统计,元丰、元祐年间朝廷都没有向蔡州派遣学官,说明蔡州的教育事业并不发达。^③杨文春指出,北宋时期,蔡州虽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周边的许州、颍州相比仍有差距,更别提跟开封与洛阳相比了。^④蔡州学官实自秦观担任蔡州教授时始设,所幸蔡州知州很支持秦观的工作,才使蔡州官学渐入正轨。蔡州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蔡州地区的学生,让他们可以参加州学考试(即解试)、然后获得赴京参加贡举的机会。这对秦观来说,自然不在话下:第一,秦观自己身经百战,对解试了如指掌。第二,随着哲宗即位,虽然考试规则没有立刻更改,但已引发讨论,客观上阻碍诗赋取士的冰雪正在消融。第三,秦观早在元丰六年的《银杏帖》中就期待“谋一主学处”,如今终于实现,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主观上愿意努力。

(一)斯文沦丧:扭转蔡州读书人轻文之风

但推行文学教育的困难也是很明显的,其中最大的困难,是蔡州读书人一开始对诗赋文章非常蔑视。本来蔡州就缺少兴学的风气,故取解也相对容易,^⑤再加上熙丰年间一直以经义取士,蔡州读书人对诗赋文章的价值认识得并不到位。为此,秦观撰写了《春日杂兴十首》其十:

艺籍燔祖龙,斯文就沦丧。帝矜黔首愚,诸雋出相望。扬马操宏纲,韩柳激颓浪。建安妙讴吟,风概亦超放。玉绳带华月,艳艳青冥上。奕世希末光,经纬得无妄。儿曹独何事,诋斥几覆酱?原心良自诬,猥欲私所尚。螳螂拒飞辙,精卫填溟涨。咄咄徒尔为,东海固无恙。鹄鸾日彫灭,黄口纷冗长。投袂睨层霄,兹怀谁与亮?^⑥

徐培均认为该诗是对程颐以诗为“闲言语”的驳斥,^⑦恐不确。首先,程颐自己也作诗,只是不经常作诗,并不是说所有的诗都是“闲言语”,他在给王子真的诗中就劝其不要独善一身,故程颐认为自己虽是“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⑧,很显然,他认为他写给王子真的诗就不是闲言语。其次,程颐认为,作诗要合“诗人格”就不得不下功夫,而“既用功,甚妨事”^⑨,言外之意,只要不妨事,作诗也可

①经义取士中的经义教育算不算文学教育?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来看,经义当然算文学作品,但从“文学教育”中的“文学”概念来说,这里的“文学”虽然是广义的,涉及纯文学和杂文学,经义作品似可包含在杂文学类中,但当时经义取士的目的并非造就文学之才,且在具体的培养过程中有意识地挤压、侵占诗赋传习之类的文学教育,故揆诸培养目的与培养实际,不能将新法时期的经义取士视作文学教育的内容之一。随着后世经义、诗赋分科取士制度的完善,经义不再与诗赋形成对抗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融合,此时的经义教育始可视为文学教育的内容之一。

②目前学界对教师个体的文学教育思想研究较少,这也导致很多研究成果难以灵活有效地被当下的文学教育从业者借鉴,值得我们注意。此处所谓的文学教育思想,是教师个体关于文学教育各方面的思考与想法,它既表现在相关文字的直接表述中,也通过文学教育活动间接地体现出来。

③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1-212页。

④杨文春:《唐宋时期蔡州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以民风风俗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2013年。

⑤谢良佐与秦观同为元丰八年进士,曾因蔡州解试容易而打算返蔡考试:“上蔡谢先生良佐,学于伊川,忽请归试曰:‘蔡人罕习《礼记》,易于取解。’”〔宋〕俞文豹撰,许沛藻、刘宇整理:《吹剑四录》,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201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109页。

⑦徐培均著:《秦少游年谱长编》卷四,“元祐二年丁卯(一〇八七)三十九岁”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23-324页。

⑧〔宋〕刘安节著,陈光熙点校:《刘左史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161页。

⑨〔宋〕程颢、〔宋〕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9页。

以，这实际上与苏轼、秦观等人的观点亦可相通。最后，就算秦观写诗针对程颐之论，也不该称其为“儿曹”“黄口”，因为程颐比秦观大十多岁。不过“儿曹”“黄口”等语启发我们，此诗所针对的恰是那些对文学有偏见的蔡州学生，而与秦观此时担任蔡州教授的身份正好契合。

因为此诗的风格，颇学韩愈《调张籍》诗。韩诗作年，有永贞二年^①和元和十一年之说^②，前说时韩愈为国子博士，后说时张籍为国子助教，故诗中口吻多为老师批评学生，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③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④联系韩愈或张籍的教师身份可知，《调张籍》中的“群儿”实际上是老师批评学生的语气。秦观此诗既然是学习韩诗，自然也是表达对学生的看法。

正是从州学教授的教师身份入手，秦观在诗中表达对学子轻文的批评。首四句，秦观以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斯文”扫地的局面入手，表扬那些在残酷氛围之下勇敢突围而出的文学大家。言外之意，显然是对眼下能够自由学习诗赋文章却不愿用功的学子的当头棒喝。接着，秦观回顾了后世王朝的代表文人，对扬雄、司马迁、司马相如、韩愈、柳宗元、建安七子等做了高度评价。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文学之光代代相传，天地经纬也因此没有乱套。后面话锋一转，切入对眼前学子的批评。秦观不理解：“儿曹独何事，诋斥几覆酱？”秦观因取消诗赋考试而困顿场屋多年，对“斯文”扫地深有体会，故不能理解眼前学子对诗赋文章的诋毁排斥。秦观认为，这是违背良心的私欲所致。但不管如何，这些行为在秦观看来不过如螳臂当车，所挡之车不会毁损，因为历史大势不可阻挡。这简直就是韩愈“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翻版。

秦观对重振斯文是自信的，可他作为蔡州教授，不能独善其身，故在引领学子时不能不对此表示担忧，害怕像鸾凤般的人才越来越少，而像黄口小雀般的此类错误言论越来越多，因此写下这首诗加以批评，却又担心不重视诗赋的学子不擅长解读诗赋，不能真正懂得他的用意。

（二）拟诗与议论：秦观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为了重振斯文，秦观特别重视文学教育，亲自跟学生一起模拟解答考试题目，通过拟作来手把手教学生如何作诗、发表议论。最能体现秦观文学教育内容的，是保留至今的两篇拟郡学考试的作品。先看《拟郡学试东风解冻》：

宝历新开岁，春回斗柄东。清生天际水，冻解日边风。浩荡依蘋起，侵寻带雪融。江河霜练静，池沼玉奁空。鱼藻雍容里，云霄俯仰中。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⑤

诗中先说哲宗改元丰为元祐，北斗七星的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接着说日边的风解冻，天边的水生起涟漪。首四句接连出现“宝历”“斗柄”“天”“日”，这些词汇都暗寓君王，说明春回大地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紧接四句写春回大地后的环境变化，浩荡春风起于青蘋之末，渐使积雪消融。江河澄净如白练，池沼水平如镜。末四句鼓励学生在这样的大好时代，要像水中鱼，雍容自由，而那如云霄一般的功名也能俯仰可得，因为“更无舟楫碍，从此百川通”。显然，诗中充满老师对学生的鼓励。

①[宋]吕大防等撰，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7页。

②[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册，第1079页。

③诗中的“群儿”，或以为指元稹，此说明显与元稹之身份不符，且“群”字亦非元稹可当，故调和者云：“群儿兼指当时附和者说，何独蔽罪于元耶？”（[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册，第519页）甚至干脆还拉白居易作陪，但亦不可信，因为元稹也好，白居易也罢，都不是“故谤伤”，他们是以非常严谨的态度来评价李杜诗歌的。如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对杜甫的高度评价都是有根据的，对李白也没有一棍子打死，也肯定了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的成就（[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91页），而白居易《与元九书》对李杜诗中缺乏风雅比兴的作品进行批评，也是为了表达对“诗道崩坏”（[唐]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3页）的痛楚和振起诗道的勇气，因而是以白居易心中的“诗道”为标准来严肃评论的，精于诗歌的韩愈，怎么可能读不懂元白评论李杜之严肃性，而视之为“谤伤”呢？故四库馆臣引《竹坡诗话》云：“辨韩愈《调张籍》诗非为元稹作。皆有特见。”（[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86页）此论甚是。

④[唐]韩愈著，[清]方世举编年笺注，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第517页。

⑤[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288-289页。

然而,学者对此诗却有不同的理解,恐误。^①秦观此诗实际上是通过亲自示范,一方面给蔡州学子学习律诗打个样,另一方面则鼓励他们努力前行,未来大有可为。

而秦观如何教学生发议论,则在《拟郡学试近世社稷之臣论》中体现得最为详细,故这篇拟论可看作秦观特意从立论、论证两方面来教学育人的典范之作。先看立论方面。题目是“近世社稷之臣”,这个题目有迷惑性,看似是让考生讨论近世的社稷之臣,实则题目出自扬雄《法言·渊骞卷》,当时有人问扬雄何为“近世社稷之臣”,扬雄回答说:“若张子房之智,陈平之无误,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终之以礼乐,则可谓社稷之臣矣。”^②因此,“近世社稷之臣”的题目,考的是对扬雄此话的理解,而不是让考生漫无边际地抒发己见。秦观立论之始,就一边破题,一边提出观点,他说:

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至矣!忠足以竭才性之分,敏足以应事物之变。苟利社稷,则遂事矫制,虽君有所不从。苟害社稷,则伏节死谊,虽身有所不顾。夫人莫不尊于君,莫不亲于身。君与身也,犹有时而忘之,知有社稷之事而已,况其它乎?此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也。^③

所谓“古之所谓社稷之臣者”,看似跟“近世社稷之臣”的题目矛盾,实际上是告诉考官,自己知道此语出自《法言》,故将其归于“古”。接着总论对扬雄之言的理解,开篇明义,而不迂回。秦观的理解是,扬雄对社稷之臣的看法很到位,社稷之臣要“忠敏”,既能竭尽才性之分忠于社稷,也能敏捷地应对事物的变化,眼中只有社稷利益,在社稷之事面前既不顾君,也不顾身。秦观对扬雄话语的概括,肯定融入了秦观自己的观点,从秦观曾批评神宗来看,他确实不顾君、身。因此,秦观虽在示范立论,实则也是在育人。

接下来秦观开始根据扬雄的话展开论述。先是反面论证,对错误理解扬雄之言的看法进行驳斥。秦观认为,扬雄并不是看重张良“运筹帷幄”之智,陈平“算无遗策”之“无误”,周勃所向披靡之果敢,霍光从未犯错过之勇猛,因为从这些角度来看,战国的纵横家末流和普通的庸人都能做社稷之臣,这肯定不是扬雄的意思。

接下来开始正面论证扬雄之意。张良之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天下初定,功臣论功行赏之际互不相让,眼看要生叛变,张良出主意,让刘邦先封他最讨厌的雍齿为侯,大家一看连雍齿都能封侯,就知道自己也有机会,叛乱之心自然平息;二是刘邦想废太子之时,张良出计巩固太子之位,使刘氏不至于在刘邦去世后发生内乱。同样的道理,陈平、周勃的“无误”“果敢”,也主要体现在平定诸吕、迎立汉文帝上,而霍光则拥立汉宣帝使天下太平二十年,这是霍光之勇。但他们也有缺点,霍光不学无术,身死族灭,陈平多有“阴祸”,周勃差点被汉文帝误会为谋反,张良虽无过,却也没有为汉朝制礼作乐,以圣人之道而言,他们都不算“全人”,故扬雄在评价四人后,给出“终之以礼乐”的建议。

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看似缜密,但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确定这就是扬雄之意呢?从今天的研究角度来说,“作者之意”是没法完全坐实的,但在古代,“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才是最要紧的,因此,秦观不能就此结尾。他在仔细剖析扬雄文字之际,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扬雄对四人的称呼不同,秦观认为这就是扬雄学习春秋笔法的表现,故探究扬雄对四人称呼之差异,也就能较好地明白扬雄之用意。秦观先讲春秋之法,是通过优先级不同的称呼来表达褒贬的:“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爵,爵不若子,因此等以寄褒贬焉。”^④从州国到爵子,表现出严密的称呼体系及其背后褒贬之

①《王直方诗话》认为此诗表达的是秦观“始作蔡州教授,意谓朝夕便当入馆,步青云之上”的意思,等到秦观写《送张叔和兼简黄鲁直》时,因有“大梁多豪英,故人满青云。为谢黄叔度,鬓毛今白纷”(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171页)之句,《王直方诗话》又评价道:“说者以为意气之盛衰,一何容易!”(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8页)且不说秦观困处蔡州多年,“久不召用”,意气有所盛衰再自然不过,就拿这两诗来看,《拟郡学试东风解冻》也主要是抒发作为蔡州教授的秦观,以大好前途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此时秦观困守一州学官之位上,谈什么“从此百川通”呢?如果是说秦观自己,他还困守蔡州,并不通达,更别说通百川了。以此刻并不通达的自身作为榜样来引导学生,学生会相信吗?故《王直方诗话》的评价是不可靠的。

②[汉]扬雄撰,汪荣宝注疏,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71页。

③[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778页。

④[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779页。

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秦观解释说：“氏者别其所自出也。字以言其德，名以言其体，爵以言其功，官以言其业。”^①原来每个称呼所指向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所具有的象征含义及其褒贬态度也就有了差别。这种称呼还可以各自组合，如扬雄称张良为张子房，张是氏，子房是字，对照秦观的解释，字是用来称赞其德的，故扬雄称张子房，用意是言其德。以此类推，陈平是言其体，绛侯勃是言其功，霍将军是言其业。四人之中，张子房最佳，故称其字，绛侯勃最差，故不称其氏。只有读懂扬雄的深意，才算读懂《法言》。

论述到此结束，但问题还存在，故即便有如此严密的论述，秦观在强调扬雄之意时，却仍接连使用“盖”字，如扬雄称张子房，“盖言其德也”。既然秦观觉得这样论述才深入，为何还要用“盖”字呢？这不是自毁长城吗？实际上，有时候退一步用“盖”表达可能性，并不是不严谨，反而是更严谨的表现。因为秦观文后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共同价值观，比如德最高，功最下，这是儒家思想的评价标准，放在其他价值体系或语境中就未必会有这样的结论。如南宋王之望《近世社稷之臣如何论》就认为扬雄对四人的评价过于苛刻，^②王之望在南宋救亡图存之时发此议论，显然是为现实服务的，故与秦观之论不同。又如秦观好友晁补之在《西汉杂论·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中评价四人功劳后说：“此其于国，皆当伊、周之任，因祸而为福，转败而成功者，故扬雄以谓皆近世社稷之臣。”^③晁补之的观点显然也与秦观有距离，是因为晁补之文章的主要论述对象是汲黯，论述他为什么没有四人功绩却被汉武帝称作“近古社稷之臣”，晁补之给出的结论是“内诚中正，则利贯金石而不御，虽莫见于事，而其精神固已外讐矣”^④，即从精神的威慑力角度来论述汲黯的社会价值，最终落脚点也是为社稷服务。相比王之望以今绳古、晁补之以扬论汲，秦观对扬雄之言的理解无疑是更为客观、全面、精深的。这也可以证明林纾对秦观精于考据、善发议论的理解是正确的。

当然，在精细严谨的考据之外，秦观并非只是为了教学生考试。他是在精密考证扬雄深意的基础上，将四人的优点及其不足揭示出来，从而树立内忠外敏、社稷重于国君和自身的士大夫榜样，这种士大夫榜样，不仅能像汉代四杰那样转祸为福、安邦定国，还能修身养性、修礼作乐，这样的宋代士大夫典范，虽然迥异于汉代，却是宋人的理想士人形象。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也是宋代思想的主流价值，这也是秦观认为张子房最佳、周勃最下时潜在的评判标准，因为张良最接近宋代理想士人形象，而周勃离得最远，故秦观在这一点上直接给出了结论，将它视作不言自明。那秦观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从身心到社会：秦观推行文学教育的显著成效

在长达五年左右的州学教授生涯中，秦观不仅完善了蔡州官学，而且教书、育人齐头并进，从个体人才培养到推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下面主要从三方面加以概括。

首先是发挥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成功扭转了蔡州当地的社会风气。秦观非常重视州学教授的教化作用，元祐元年四月，孝子徐积因王觌、林旦荐举，担任楚州教授，但有人反对，“吏所以欲罢去之，盖以仲车患耳聋故也”^⑤，不过当时的楚州太守裴守^⑥仍旧礼遇徐积。元祐七年，楚州太守蹇序辰在《荐徐积乞改官状》中，对徐积担任楚州教授的作用说得很清楚。第一，徐积早年是为了奉养母亲，再加上耳聋，才不愿做官。第二，无论是道德、学术还是资历，徐积都是楷模，不必以“论年理任”的常法来对待他。第三，徐积作为“真贤实廉”，担任楚州教授，可以使“一方之人，知所矜式，庠序学者，彬彬加多，至有革顽立懦，勇于为义”^⑦，起到很好的教化效果。同为州学教授的秦观元祐元年听闻徐积遭遇，就写有《徐仲车食于学官，吏或以为不可，欲罢去之。太守不听，礼遇如初，感之而作》，其意见与后来蹇序辰的意见比较一致，可见蹇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779页。

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7册，第409页。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6册，第287页。

④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6册，第287页。

⑤[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168页。

⑥此据李之亮说。见李之亮：《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93页。

⑦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0册，第216-217页。

序辰等人也同意并吸收了秦观的看法。

正是因为秦观奉行教化并身体力行,使蔡州风气出现较大变化。秦观初来之时,“创置之官,居处什物之类,百色皆无。自供职已来,干乞营缮,殆无须臾之闲”^①,因为蔡州州学教授之官自秦观始设,故州学之中百物欠缺,不仅工作用品(如参考书籍之类)缺少,连秦观自身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秦观任职以来,忙着四处筹集资金、营建屋宇,没有片刻休息之时。经过秦观的努力,不仅蔡州州学规模初具,而且使犷戾的蔡州变得“风气和平”,无形之中使蔡州风俗发生很大变化。这当然跟秦观的主观判断有一定关系,毕竟秦观只是从州学教授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蔡州的,因此是“汝南虽当孔道,人事绝少,风气和平,鱼稻蔬果,不减于淮海”,但从“士子亦乐于相从,养亲读书之计,极为安便”^②来看,秦观自身的教化效果也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原来所担心的能否教好蔡州学子的问题现在也有答案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被秦观所影响,而变得乐于求学。

其次,秦观不仅成功扭转了蔡州学子轻文的学风倾向,还与当地学子诗歌唱和,互相勉励,传为佳话。重振斯文的努力使秦观获得了知音,如夏侯太冲秀才。秦观作有《次韵夏侯太冲秀才》,诗中以“闲散”自喻,以静若僧房比喻所居之处。诗中的秦观,晚上大腹便便,在北窗支枕看北斗七星,若得好酒,中午还醉眠不醒。好不容易醒来,就拿起笔砚像潘岳那样创作《秋兴赋》。据汤斌研究,《秋兴赋》的主旨是“通过对秋景、秋色、秋气的描写,借以表现自己的感受与内心苦闷”^③,与秦观此时困于州学教授之位类似。不过,秦观并没有像潘岳那样改变志向和性情,变得非常钻营,而是在抒发完沉沦下僚之情后,马上赞赏目前生活的懒散真率,又认为这种生活虽贫却不“病”。

值得注意的是,在《次韵夏侯太冲秀才》诗中,秦观所写的“病”,不是指身体之病,而是用原宪的典故。原宪居住鲁地,住处狭小却弦歌不辍。子贡乘坐大马轩车来拜访原宪,车马进不去。子贡见到原宪,看他以华皮为冠,用藜藿为杖,没有仆人,亲自来开门,就问他生了什么病。原宪回答说:“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愚,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④原宪认为,曲学阿世才是病,那些曲学阿世之人,虽然获得富贵,却违背了仁义,这才是真的病了,而自己不过是因为性格刚直而不售所学,所以没有钱财,这只是贫穷罢了。原宪言外之意是觉得子贡不能践行从孔子那里学来的仁义,虽大马轩车,富贵无比,却是真的有病。果然,子贡听后露愧色。秦观引用这个典故,表达自己愿意行其所学而不阿世的志向,并引夏侯太冲为知音,故吐露心声说:“钟鼎与山林,人生各天性。”^⑤这就比原宪更进一层,更具有包容性。秦观认为隐居与做官,都是人生各自天性所在,不必厚此薄彼,或薄此厚彼,言外之意,只要各尽天性,做官或不做官都行。夏侯太冲是秀才,也就是读书准备应举的士子,秦观这么说,就将做学官的自己和还没做官的夏侯太冲视作各尽天性的知音,既是自勉,更是勉励夏侯太冲。

最后,秦观还以文学艺术来治病,使文学教育在促进身心健康、提升人格境界等方面的作用得到证实和推广。由秦观《书辋川图后》可知,秦观在元祐二年夏天曾得过消化不良的肠胃病,卧在学舍里休息,好友高符仲拿着王维《辋川图》来探望他,说看画可以治病。秦观高兴得让儿子在旁边打开此画,自己则在枕上看。恍惚之间,秦观与王维一起进入辋川,游览山水,下棋喝茶,赋诗娱乐,忘记自身滞留蔡州、不被重用的困境,果然几天就好了。好了之后,高符仲过来取图,说是要给夏侯太冲看,看来夏侯太冲也因不得志而身体有恙,秦观就“题其末而归诸高氏”^⑥,想通过题跋来劝慰处境不好的夏侯太冲。

高符仲也是秦观和夏侯太冲的朋友,毕仲游《与赵司业》其二云:“某悚息待罪河东浸久,不称之事益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1208页。

②[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1208页。

③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魏晋卷·秋兴赋》,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301页。

④[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54页。

⑤[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169页。

⑥[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1121页。

多。如蒙海督，使免于戾，则为赐深矣。高符仲旧不之识，一见知其为君子人也。”^①由毕仲游《与赵司业》其一可知，此赵司业为赵正夫，^②即赵挺之。赵挺之曾受苏轼批评：“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黄庭坚监德安镇，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及召试，苏轼曰：‘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至是，劾奏轼草麻有云‘民亦劳止’，以为诽谤先帝。既而坐不论蔡确，通判徐州，俄知楚州。入为国子司业。”^③而赵挺之向毕仲游推荐高符仲，可见高符仲与赵挺之、毕仲游、秦观、夏侯太冲等皆有交往。说明秦观培育人才，并无党派观念，也不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一定去做官，只要身心健康，学以为己，教以为人，行其所学，不曲学阿世，虽贫不病，可矣。

三、回归之道：秦观文学教育的当代启示

秦观力行文学教育并取得成效，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这不仅是元祐地方文学教育的典型样本，呈现出政治、文化与教育的多样互动，也在推行过程中教学相长，促进秦观自身文学创作和学子们学习能力的不断提升，更对今天存在不少问题的文学教育现状及其改进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启示。

（一）文学教育者的坚守与变通

文学教育能否取得成效，文学教育者的坚守是极其重要的。秦观幼习诗赋，等他熙宁、元丰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时，却不考诗赋，转为经义取士。但秦观不愿轻易改弦易辙，导致自己淹留场屋近二十年，遭受众多的嘲笑和白眼。也是在这种磨难之下的砥砺创作，使其文学水平变得更加突出，这才能在元祐更化机会到来时准确把握，及时推行文学教育。像秦观这样有骨气的人很多，如丁鹭。吕公著掌记云：“丁鹭，自行新法，不肯为知县，故至今资叙不振，已除太常博士、正言。”^④由于丁鹭是靠诗赋取士的，信道笃，不违所学，在新法推行期间恬处二十年，不屑求进，直到元祐更化后才出来做官，故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教育非常重视。

早在元祐元年闰二月，刘摯就上奏要恢复科举旧法，希望诗赋、经义兼用，^⑤但司马光有不同意见，认为当以德行、经术为先，文学、辞采为后，即便是文章之士，也需要考经术。^⑥由于元祐三年科考在即，马上改变考试标准，学生会无法适应，故元祐元年四月苏辙建议，元祐三年科举内容不变，只是经义“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⑦，到元祐五年再全部改过来。到了元祐三年以后，诗赋取士正式恢复，并将在元祐五年科举考试中施行。可是丁鹭发现，之前的太学博士和州学教授，大多是因经义而进，对诗赋了解不多，就建议朝廷多启用擅长诗赋的“老师宿儒”来充当内外教官，这样才能真正把诗赋取士落实下来，故元祐三年三月左正言丁鹭上奏说：“窃睹明诏，欲于后次科举以诗赋取士，天下学者之幸也。然近时太学博士及州郡教授，多缘经义而进，不晓章句对偶之学，恐难以教习生员。臣愚欲乞下两省、馆职、寺监长贰、外路监司各举二人曾由诗赋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内外教官。盖经义之法行，而老师宿儒久习诗赋，不能为时学者，皆不就科举，直候举数应格，方得恩命。今或举以为教官，当能称职。伏乞二圣早降睿旨，使四方多

①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0册，第368页。

②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10册，第368页。

③[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册，第11093-11094页。

④[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册，第9790页。

⑤[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第8859-8860页。

⑥[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第8979页。

⑦[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第9060页。

士一变妄诞穿凿之风，而趋规矩准绳之学，天下幸甚！”^①丁骢所谓“后次科举以诗赋取士”是指元祐五年科举将恢复诗赋取士。而秦观元祐五年五月庚寅从蔡州学官升为太学博士，虽与范纯仁以“著述之科”^②加以举荐有关，但实际上在范纯仁之前，曾肇、鲜于侁都响应司马光的号召，以十科中的著述之科举荐过秦观，却没效果。直到范纯仁举荐，才起作用，任秦观为太学博士，这大概跟丁骢所说当时朝廷缺乏擅长讲授诗赋的太学博士有关。由此可见，秦观、丁骢等人的坚持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坚守的同时，秦观也听从苏轼的意见，做了适当的变通。苏轼乌台诗案爆发被贬黄州，刚到黄州，苏轼就写信给秦观说：“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③苏轼认为，像秦观这样有才干的人，家里又不富裕，少不了要出来做官拿俸禄养家糊口。科举考试当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但科举考试有很多其他因素，不能保证一击必中。有鉴于此，苏轼建议秦观一边好好准备科举考试，一边最好多多“著书”，像他寄给苏轼的讨论兵法、盗贼的那些文章，写个数十篇，文章要能实用，而不必评论时事。一旦此书写成，肯定会有赏识的人出现，到时候即便没有考中进士第，秦观也能从军或做幕僚，发挥书中的才华，谋生就不成问题了。尽管苏轼鼓励秦观“著书”，却也在后面强调“亦不可废应举”，让秦观要有所变通，以适应新的考试规则，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秦观按照苏轼的话实践，不仅自己应举成功，也有更广阔的视野（比如经学视野）来推行文学教育，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以身作则：不断成长的文学教育者

当下流行“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看法，这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的道理，文学教育者如果不会文学创作，那将如何教育学生呢？秦观本身就是当时的一流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并非一般文学教育者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但秦观在推行文学教育的同时，不断创作，不断成长，这应该是文学教育者都能有所借鉴的。由秦观之事来看，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助力一般文学教育者的成长。

首先，文学教育者不能脱离时代需求，要密切关注甚至参与时代的文学事业中去，让文学创作在现实社会发挥作用。秦观虽是州学教授，却承担了很多蔡州公文写作。这里以刘颁担任蔡州知州时的事例为代表，略加论述。元祐元年六月，刘攽来守蔡州，秦观得到刘攽的信任，帮他写了一些应用文，较为实际地参与蔡州地方治理中来，如《代贺明堂礼毕表》，此文明确写到宋哲宗第一次举行盛大的明堂礼，其时间在元祐元年九月，此时正是刘攽守蔡州，故可确定为秦观代刘攽所作。

在贺表中，秦观以刘攽的口吻，对哲宗之政进行夸赞，尤其是“擢英髦而共政，革苛弊以济时”^④句，对元祐时期的政体模式及其施政导向作了较为精炼的概括。然而，这种揭示，后世学者往往延续新旧党争的思维来解读，如徐培均云：“此谓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人，革除青苗、免役、方田、保马诸法。”^⑤这当然大体不错，但实际上秦观对“苛弊”之政的理解，恐怕未必全在新法一方。在秦观的政治理解中，赵宋家法中“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政”模式与神宗、王安石变法的加强专政以富国强兵的模式之间的不同，才是最为关键的，而非新旧法之争，故《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元年五月，自蔡确、章惇罢相，司马光卧疾，韩缜去位，吕公著常摄宰相事。之前执政官三五日一聚，故难以每事商量，司马光建议多聚议，蔡确没有采纳。而“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为故事”^⑥，这才是秦观所赞颂的“共政”。值得注意的是，在贺表的最后，

①[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7册，第9963页。

②[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第317页：“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著述之科是司马光所创十科之一。

③[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1536页。

④[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860页。

⑤[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861-862页。

⑥[宋]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5册，第9147页。

秦观委婉地表达了对刘攽未能躬践盛会而任知州的遗憾，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朝廷能早日请刘攽回朝任职。果然，到本年十二月，刘攽就回朝升任中书舍人了。由此可见，秦观通过自身公文写作及其发挥的作用，来指导学生，提升自我，回应社会，自然比枯燥的讲学更有效果。

其次，文学教育者当然也需要不断学习，这才是保持进步的源头活水。秦观就是如此。在刘攽离开蔡州时，秦观写了《送刘贡父舍人二首》。第一首回顾了刘攽的为官经历，将他的被贬与复用视作与天下有关的大事。第二首则对刘攽支持自己的蔡州兴学之举作了大力的颂扬。秦观始来蔡州时连住处都没有，却一心努力建设蔡州州学，在得到刘攽的支持之后，众人也都愿意帮助秦观修筑室宇。就像仓皇渡水时的大葫芦价值千金一样，刘攽在秦观最慌乱无措的时候施出的援手，使秦观备受鼓舞。秦观认为自己只有不断好修以为常，才能报答刘攽的帮助。秦观确实在向刘攽学习，林纾云：“当时精考据者以刘贡父为最，常笑欧九不读书，以《集古录》欧公有言皆引贡父，故贡父从而轻之。少游与贡父同时，此数篇之文，语语皆有根据；然长公文字，则未尝有此。”^①林纾指出，秦观《法帖通解》等篇文字与刘攽作品一样精于考据，而苏轼似少这类文字，说明秦观不是从苏轼那里学的，而是确实以刘攽为榜样，学了他的治学精神。

最后，文学教育者应该积极参与文学交流活动，尤其是带有文学竞技色彩的交流，能大幅度提升文学教育者的创作水平。秦观就是在文学交流活动中，诗学成就大放异彩的。有一次在程文通组织的文会上，秦观写了一首赋咏牵牛花的诗：“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栏干。仙衣染得天边碧，乞与人间向晓看。”^②《桐江诗话》称赞此诗“真佳作也”^③。大概是将牵牛织女的故事巧妙融入牵牛花中，显示出用典的妥帖与生动。不止如此，又过了一年，蔡州知州王存生日快到了，程文通等人带着给王存写的贺寿诗草稿来拜见秦观，秦观就把自己准备的贺寿诗拿给他们看，开头几句话说：“元气鍾英伟，东皇赋炳灵。冀敷十一英，椿茂八千龄。汗血来西极，抟风出北溟。”^④大家都被秦观诗震慑住，愕然相视，读完全诗，都不敢把衣袖中的诗歌拿出来给秦观看，就唯唯诺诺地离开了。^⑤程文通是秦观的同僚还是学生，目前缺乏实证，从诗话所记录的情况来看，秦观在蔡州还是遇到很多挑战者的，但秦观并没有退缩，而是积极融入其中，并以他的才华征服众人。

（三）回归文学：文学教育的再出发

以诗赋取士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教育，之所以能延续很长的时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然而，随着西学东渐，西学中的文学教育危机也出现在我国文学教育之中，使文学如何成为知识变成了一个问号。^⑥实际上，这个问题古人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回答，但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以至于今，本来发源就不够健全的文学教育，又遭受到新技术的各种挑战，更加摇摇欲坠，颇有名存实亡之势。结合秦观、苏轼等人的思考和实践，我们起码可从三方面来为当下的文学教育赋能，让文学教育以更健全的身姿体魄重新出发。

第一，继承中国传统的“诗教”“文教”资源，为当下的文学教育注入强大的文化灵魂，使文学教育更好地落地生根。秦观在重振蔡州学风的时候，就积极提倡“斯文”传统，秦观在诗中将斯文传统的破坏归结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上，也说明秦观所要振起的“斯文”，实际上就是以“诗教”“文教”为主的儒家礼乐教化思

①[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中册，第1150页。

②[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1页。

③[宋]蔡正孙撰，常振国、降云点校：《诗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59页。

④[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71页。

⑤元祐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蔡州太守王存生日，僚属照例要献寿诗，其中秦观的诗写得最好，前文已提及，这里来分析一下它究竟好在哪里。首先，秦观在诗中将小青字韵押尽，其次，全诗用典精准，字词雅致，与王存的身份契合，最后，在如此严谨的技术要求下，秦观却生动、流畅地将王存出生至今的人生履历娓娓道来，并在诗尾诚挚地祝福王存能早日返朝，以便“巍然庙堂上，永作世仪型”（[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219页）。由此可见，秦观是将王存视作士大夫典范的，秦观本人也以王存为学习榜样。

⑥详见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中的相关内容。

想。但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废除诗赋取士传统。因为这些变革的始作俑者就是宋神宗,^①故秦观、苏轼曾批评宋神宗颇似破坏文化的秦始皇,为此秦观还曾入狱。秦观《对淮南诏狱二首》其二云:“淮海行摇落,文书亦罢休。风霜欺独宿,灯火伴冥搜。”^②文书即诗书,出自贾谊《过秦论》,其文云:“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③秦观《次韵传道自适兼呈都司芸叟学士》亦云:“药餌过三伏,文书散百忧。”^④秦观引贾谊《过秦论》中的“文书”一词,实含有将宋神宗废弃诗书之举比作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意。而将宋神宗比作秦始皇,是秦观自始至终的看法,故绍圣元年刘拯弹劾苏轼、秦观云:“观浮薄,影附于轼,故《进策》谓秦二世不变始皇之法而至于亡,汉昭帝变孝武之法而存,轼遂考为第一。”^⑤因为是写于宋哲宗时,故“始皇之法”显然指宋哲宗之父宋神宗之法。参寥子认为秦观将宋神宗比作秦始皇的言论,直追贾谊高远之论,其《哭少游学士》云:“当时所献策,考致第一流。论高追贾谊,气胜陵马周。胜理非空文,灼可资庙谋……平生所著书,字字铿琳球。子道决不泯,千载传芳猷。”^⑥参寥子是秦观挚友,又曾推荐曾肇与秦观相识,所了解之内情当属可信。且秦观在《法律上》中明确赞同贾谊之论,如:“贾生曰:‘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商周秦事以观之也?’呜呼!若贾生者,可谓知治体矣!”^⑦可见秦观不仅在谋篇布局上学习贾谊《陈政事疏》,而且更从思想上接受贾谊的观点,将讨论的对象直指“人主”,因此,参寥子认为秦观之论甚是,可以传之千载。正因为《诗》《书》等经典蕴含着经过几千年实践检验的儒家礼乐教化思想,才能使秦观冲破当时的思想迷雾和现实云烟,看见文化传承的康庄大道,从而坚定地继续守护下去。

第二,适当限定文学教育中的教育属性及其教育目的,不宜过分夸大教育的作用,而应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可操作标准,使文学教育中的教育更为具象化。苏轼早就指出教育、考试之类方法在选拔人才上的限度问题,一旦超过,就会适得其反。如培养人的德行,本是好事,然而一旦把德行纳入考试内容中,则容易使人作伪。在苏轼看来,诗赋取士作为教育考试的内容,不是为了突出诗赋的重要,而是因为诗赋有一定的创作规则和规律,学生可以较好地掌握,考官也能比较客观地批阅,如此而已,故苏轼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⑧因此,从尧舜以来,都是以言取人,因为考试的作用就是如此,如果要考核人才,那就是另一套考功办法来发挥作用,而不应跨过这个步骤,直接放到考试中来。作为苏轼的得意弟子,秦观就是这么做的,他非常注意文学创作中的技巧和法则,并以此教人。秦观不仅在诗赋歌词创作上注重技巧,讲究声韵与用字,对文章上的技巧也很上心,故其《精骑集序》云:“比读《齐史》,见孙搴答邢词云:‘我精骑三千,足敌君羸卒数万。’心善其说,因取经、传、子、史事之可为文用者,得若干条,勒为若干卷,题曰《精骑集》云。”^⑨由此可见,秦观是以“可为文用”的标准在经传子史中分门别类地搜集材料的,而其“精骑”之说,不仅与其“奇材”之论相符,也说明他对章法的重视。当然,这里的“文用”之文,其含义不仅仅指文章,应该也包括其他文类。虽然秦观也讲技巧,但对技巧本身也如苏轼一样保持极大的警惕,认为纯讲技巧的作品“是何等文字”,故这里我们也只是点到为止,不再作条分缕析。

第三,文学教育除了教育属性之外,还有文学属性,其文学属性才是文学教育的根本所在,故当务之

①肖鹏认为:“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皇帝本人发起了一场关于科举制度革废的大讨论。”(《“以文取士”何以“知人之才”——宋神宗时期科举制度革废辩论之解析》,《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1期,第136页),并引《宋史》为证,可从。

②[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277页。

③[汉]贾谊撰,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增订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④[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287页。

⑤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册,第4851页。

⑥[宋]释道潜著,陈小辉校注:《参寥子诗集编年校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⑦[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册,第558页。

⑧[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2册,第724页。

⑨[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下册,第1546页。

急是要让文学教育回归文学。但由于文学的概念人言言殊,故回归文学究竟是回到哪里,就令人无措。苏轼与秦观的看法或可给我们启发,他们都认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成长,故苏轼评价秦观有“技道两进”之说:“少游近日草书,便有东晋风味,作诗增奇丽。乃知此人不可使闲,遂兼百技矣。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①苏轼所说的技,主要指技法技艺,而道则指因草书技艺长进而增添的奇丽诗意,可见道与文学作品在一起,这也是欧阳修、苏轼等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②观念的另一种表述。秦观认可这一观点,其《孙彦同职官分纪叙》指出儒家与黄老之异云:“昔九方皋知千里之马而不知牝牡骊黄,以皋为善观天机则可,使皋为天子诸侯之有司则愈矣。此其所以为黄老家之言也。儒者则异于是,不以内废外,不以精忘麤。故上达天机之妙,而下堪天子诸侯有司之责。”^③而儒道、内外、精粗、妙责之别,就是道技的异质同构之说。这在秦观《上吕晦叔书》中得到更清楚表达,这篇文章深得苏轼赞颂,徐培均引清初钞本韩应陛校《淮海集·淮海先生杂记》云:“玉山汪氏曰:‘居仁吕公云:秦少游应制科,问东坡文字科纽,坡云:但如公上吕申公书足矣。’”^④可见在苏轼看来,秦观此文已经深谙制科文字科纽。这还只是从文章形式而言,从内容来说,也代表秦观元丰五年以来乡居高邮日以文史自娱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这显然是苏轼更看重的内在原因,如秦观文中就有“阁下之道,如元气行乎浑茫之中,其发为风霆雨露者特糟粕耳”^⑤等语。既然在苏轼、秦观等人看来,“文与道俱”,道如元气行于文字之中,文字则如元气所引发的显露于外的风雨天气,那么,与道俱在的语言文字,当然皆可视为文。文学教育如果要回归文学,首先就要回归与道俱在的语言文字中去,由培养学生对此类语言文字的感知力出发,使他们能更好地感受、建构、修改、提升每个人自身的“道”,从而将文学教育逐步内化为育人之道。

On the Literary Education and Its Value of Qin Guan

GUAN Peng-fei, HU Bing-qi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117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 the crisis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Western learning has also emerged in China's literary education, and the severe challenges fro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further deepened the crisis.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gradu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education",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depth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ducators. Qin Guan was a famous literary figure of the Song Dynasty, but his identity as a literary educator is little known.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principal of the Caizhou official school, Qin Guan vigorously promoted literary education, revitalized the tradition of Siwen, and personally taught scholars the method of poetry, prose, and discussion. Not only did he successfully reverse the local trend of neglecting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but he also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ducating and nurturing students. The rich insights contained in Qin Guan's literary education can provide flexible learning for those engaged in literary education, fully empower current literary education, an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future improvement.

Key words: literary education; Qin Guan; Shijiao; Wenjiao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宋]苏轼撰, [明]茅维编,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 第5册, 第2194页。

②[宋]苏轼撰, [明]茅维编,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 第5册, 第1956页。

③[宋]秦观撰, 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 下册, 第1625页。

④徐培均著:《秦少游年谱长编》卷三, “元丰七年甲子(一〇八四)三十六岁”条, 第229-230页。

⑤[宋]秦观撰, 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 下册, 第1195-1196页。